

区域文化的互动与发展研究

——以贵州为例

QUYU WENHUA DE HUDONG YU FAZHAN
YANJIU

张学立 肖远平 主编

区域文化的 互动与发展研究

——以贵州为例

张学立 肖远平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区域文化的互动与发展研究——以贵州为例/张学立,肖远平主编. —北京:
民族出版社,2015. 10

ISBN 978 - 7 - 105 - 14053 - 4

I. ①区… II. ①张… ②肖 III. ①区域文化—文化发展—研究—贵州省
IV. ①G127. 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56035 号

策划编辑：罗 焰

责任编辑：德庆央珍

封面设计：海龙视觉

出版发行：民族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 编：100013

网 址：<http://www.mzpub.com>

印 刷：北京彩云龙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版 次：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数：430 千字

印 张：15

定 价：50.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14053 - 4/G · 1969(汉 958)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文编辑一室电话:010 - 64271909

发行部电话:010 - 64224782

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 喻忠桂 高万能

编委会副主任 封孝伦 杨政银 金安江 修耀华 张学立
杨军昌 谢彬如 邓光华 肖远平

主 编 张学立 肖远平

副 主 编 王俊 徐则平 何兴发

委 员 喻忠桂 高万能 封孝伦 杨政银 金安江
修耀华 张学立 杨军昌 谢彬如 邓光华
肖远平 何兴发 徐则平 陈玉平 石开忠
龚 锐 赵玉娇 王俊

序 言

党的十八大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区域文化的互动与合作日益成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路径。贵州是文化资源大省，拥有奇特的喀斯特地貌文化资源、厚重的历史文化资源、多彩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等，文化资源特色鲜明，具有多样性、原生性、神秘性等特点，区域文化发展潜力巨大。

历史上，贵州经济长期滞后，经济的落后制约了本区域文化的发展。长期的封闭落后使世人对贵州的认识很长一段时间停留在“夜郎自大”、“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认识层面。贵州文化被很多人打上“落后”的标签。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贵州人逐渐认识到区域文化对贵州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贵州原生态的自然景观、多彩的民族风情及“藏在深闺人未识”的神秘元素，逐渐为世人所认识和感知。经过多年的努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贵州区域文化不断被发掘并发展，目前，“贵州多彩风”已推陈出新，走出国门。但“欠发达、欠开发”长期以来是贵州省基本省情，贵州区域文化的发展仍然相对滞后。

2012年，国务院颁布了国发〔2012〕2号文件，即《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下文简称《意见》）。《意见》指出，贫穷和落后是贵州省的主要矛盾，加快发展是贵州省的主要任务。贵州省尽快实现富裕，是西部和欠发达地区与全国缩小差距的一个重要象征，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志。《意见》明确指出：贵州应大力“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把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成为支柱产业。依托贵州多民族文化资源，建设一批文化产业基地和区域特色文化产业群。深入挖掘民族文化，做大做强以‘多彩贵州’为代表的民族歌舞、工艺美术、节庆会展、戏剧、影视、动漫等文化品牌，培育一批有特色、有实力、有竞争力的文化骨干企业，积极引进文化产业领域战略投资者。”区域文化的互动与发展必然会推动区域经济的大振兴，发展的大跨越。充分发挥区域文化的特殊功能，全面实现区域文化的发展繁荣，对于加强民族团结，促进社会稳定乃至经济社会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贵州区域文化是富民兴黔的强劲动力，高度重视贵州区域文化的互动与发展，能促进欠发达的贵州早日与全国同步小康，奋力书写中国梦的贵州篇章。

贵州民族文化学会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弘扬贵州省优秀民族文化为主线，以创新开拓、扎扎实实开展民族文化保护、传承、建设、发展、开发利用和基础理论研究和服务和谐社会、经济发展建设，兴黔富民、让贵州民族文化走向世界为宗旨。

贵州民族大学现任校长张学立同志是贵州民族文化学会的执行会长，其时刻以“发展民族教育、促进民族文化发展”为己任。

张学立校长等著的《区域文化的互动与发展研究——以贵州为例》一书，以论文集的形式对贵州区域文化发展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该书主要关注“贵州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研究”、“贵州少数民族艺术研究”、“贵州历史先贤研究”、“贵州社会发展研究”等问题，多方面、多角度挖掘、探讨了贵州区域文化资源，积极思考贵州区域文化，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等问题，为繁荣发展贵州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实现贵州“文化强省”提供良好建议。

在《区域文化的互动与发展研究——以贵州为例》即将付梓之际，略陈数言，是为序。

贵州省政协科技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贵州民族大学原党委书记
贵州民族文化学会会长
高万能

2014年1月26日

目 录

论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	张学立 王俊	1
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功能与传承保护	杨军昌 周梅 谢芝	12
文化重构情境下彝族舞蹈文化的发展与传承——以雉街彝族铃铛舞为例	陈春祥	23
试论侗款在侗族社会中的管理功效	徐则平 陈城淇	35
安顺屯堡地戏的传承与保护	蒋筝筝	44
黔西北花灯的边缘化地位及其形成原因	刘代霞	52
“无本”的贵州布依族山歌	李祥霓	62
天龙屯堡地戏的艺术特点及现状探究	赵开	67
历史的奢香与奢香的历史	王明贵 王小丰	74
石贊清年谱及大事年表	石朝江	81
水西文明及其遗产初探	卢祥运	88

概论贵州省源于黔南路的历史沿革及思南宣慰司的由来	田维华	93
李端棻对科技普及的提倡——纪念贵州建省 600 年	周松柏	106
浅论李端棻的思想	谢 敏	115
曾任周总理英文秘书的思南人——追忆新中国外宣事业拓荒者，著名国际新闻评论家、翻译家、社科情报学家杨承芳同志	李 海 张羽霞	119
贵州省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增收的对策探讨	孙苏茂 张遵东	127
贵州省旅游业与城镇化互动发展的作用机理探讨	张遵东 张文平	133
基于和谐社会建设视角的贵州省旅游业发展研究	周楠楠 張遵东	141
贵州实施“后发赶超”的思路与对策	苟以勇	151
贵州建省 600 年之“黔中三宝”	王路平	156
贵州毛南族人口与社会发展问题试论	华 骞 杨军昌 熊月铭	164
从宗教生态学角度看贵州多元宗教现象	赵玉娇	175
贵州文化品牌发展对策研究	黄 晓	183
浅析贵州少数民族人口与社会发展关系	韩 眇	198
龙图腾：基于多元一体语境的中华民族认同	马 眇	210
浅析贵州佛道儒巫宗教文化现象的突出特征	蔡贞明	218

少数民族题材京戏音乐创作与研究之管见	谭 卉 225
重拾民族学研究在贵州历史上的记忆碎片——读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有感	任瑞虹 229

论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和利用

张学立 王俊

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是一个经济学问题，更准确地说是一个民族经济学问题。作为中国本土性的经济学学科，广义的民族经济学以世界范围内具体民族的经济问题为研究对象，狭义的民族经济学则以中国少数民族的经济问题为研究对象，内容包括所有少数民族的经济问题、具体少数民族的经济问题和具体区域少数民族的经济问题等。

一、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利用的主要内容和形式

根据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利用主体的不同，对之开发利用的形式也有所不同。目前对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开发利用的主体可分为两类，一类以政府为主体，一类以民间为主体。政府主体对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和利用的指导思想通常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既追求经济效益，也追求社会效益。民间主体的指导思想则强调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向经济转化的直接性，作为无财政拨款、要靠市场养活的群体，经济效益往往是民间主体考虑的重点。政府主体对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呈现开发规模大，系统性和协作性强等特点。而民间主体对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利用则呈现开发规模相对较小，协作性和系统性弱的特点。但不管是政府主体还是民间主体，目前对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还只处于探索的初级阶段。据调研，目前对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涉及文化部对于文化产业界定的各个方面，尤其集中在影视业、演出业、文化旅游业以及文物和艺术品业等四个方面。

电影理论中常用场景、情绪和形式来作为电影类型的划分标准。根据电影形式，电影可划分为故事片和纪录片，故事片的特点是故事经人为的场景演绎，这些故事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是虚构的。纪录片的特点是拍摄者根据价值取向对场景的真实记

录，这种记录是真实的，不能虚构。新中国成立以来拍摄的彝族题材的故事片，按时间的先后顺序有《达吉和她的父亲》，由峨眉电影制片厂和长春电影制片厂于1961年联合摄制，这是峨眉电影制品厂拍摄的第二部影片；《阿诗玛》，由彝族撒尼人民长诗《阿诗玛》改编而成，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于1964年，著名的彝族女演员杨丽坤主演，这是中国第一部彩色宽银幕立体声的音乐歌舞片，该片在1982年获得西班牙桑坦德的第一届国际音乐最佳舞蹈片奖，随着电影《阿诗玛》的播映，彝族文化以一种最直观的方式第一次进入全球的视线，“阿诗玛”成为彝族文化的一个重要象征符号，成为所有彝族女孩的共同称呼；《奴隶的女儿》，由峨眉电影制片厂于1978年拍摄，著名演员潘虹以饰演片中的女主角海来乌呷而首次走上影坛；《从奴隶到将军》，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于1979年；《奇异的婚配》，由北京电影制片厂于1981年拍摄；《舞恋》，由峨眉电影制片厂于1981年拍摄；《天菩萨》，由深圳影业公司和海联影业机构（香港）有限公司于1987年联合摄制；《大凉山传奇》，由峨眉电影制片厂于1988年拍摄；《彝海结盟》，是由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于1996年摄制；《绝代：末代女土司》，是由云南省广播电视台、省民委、楚雄彝族自治州委宣传部、武定县委和县政府、禄丰县侏罗纪世界投资有限公司、云南金潇湘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云南昭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云南省鸿畅矿产品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于2011年共同投资600万元拍摄制作的云南彝族题材电影作品。该片以云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黄晓萍的小说《绝代》为蓝本，是一部以云南题材、云南编剧、云南影视机构、云南资金和云南演员为主的民族题材电影；《花腰新娘》，由北京青年电影制片厂于2005年摄制，该片荣获第11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优秀新人女演员奖、优秀导演提名奖，第12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优秀故事片提名奖，最佳观赏效果提名奖，第2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提名奖，第14届中国金鸡百花奖最佳女主角提名奖，第十届“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走山人》，由河南电影制品厂和北京中亚影视制作中心于2012年联合摄制。随着近年来微电影概念的普及推广，也有不少关于彝族题材的微电影，由于笔者对微电影表达的形式及意义尚存异议，因此暂不在这进行讨论。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于彝族题材进行电影拍摄最早是从纪录片开始的，出于当时民族识别等工作的需要，自1957年以来新中国拍摄了大量少数民族题材的纪录片。由于纪录片对于资金和拍摄的技术要求相对不高，纪录片往往成为个人、非政府组织或政府组织探寻文化多样性、表达利益诉求的好方式，这种对于纪录片的热爱体现在彝族题材当中便是产生了许多视角新颖、内涵深刻的富有价值的纪录片，如拍摄于1958年的《凉山彝族》、1988年的《火把情诗》、1992年的《中国彝族》等。由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2002级研究生杨蕊独立拍摄的彝族题材纪录片《毕摩纪》

入选第五十届洛加诺国际电影节、第十一届釜山国际电影节、2006 年维也纳国际电影节、第三十届纽约 Margaret Mead 电影节、2006 年意大利远东电影节和 2006 年香港国际电影节等，获得了社会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由于纪录片的数量众多，在此就不一一列举。

除电影外，电视剧也是彝族文化重要的表达形式。电视剧是电视机诞生后的产物。在中国，电视机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逐步走入寻常百姓家，电视剧也随之开始进入人们的文化生活。有关彝族题材的电视剧很少，进入中央电视台播映的只有三部。第一部是《美姑河奏鸣曲》，1994 年在中央电视台一台黄金时间播出。第二部是《凤氏彝兰》，该剧是一部戏曲片，改编自云南省京剧院创作的同名舞台剧。这出舞台剧一经推出就荣获了大大小小的奖项数十个，在文化部举办的“第七届中国艺术节”中荣获“第十一届文华大奖”，内容包括“文华导演奖”、“文华表演奖”和“文华剧作奖”，在“第三届中国京剧艺术节”上荣获十项大奖，囊括所有的单项奖。此外，还荣获“中国少数民族戏剧学会”颁发的国家级“金孔雀大奖”，舞台剧《凤氏彝兰》现已成为国家精品剧目。戏曲片《凤氏彝兰》由昆明市广播影视产业中心、云南省京剧院和云南光洋民族文化传播公司联合摄制。该片于 2006 年摄制完成，并在中央电视台的戏曲频道播出，先后在中央电视台的戏曲频道重复播出了 10 余次，受到观众的普遍好评。《凤氏彝兰》还荣获 2009 年第 27 届电视剧“飞天奖”戏曲电视剧的三等奖，实现了云南本土原创影视剧在“飞天奖”上零的突破。第三部是《奢香夫人》，由贵州省委宣传部、八一电影制片厂、毕节地委和行署与黔森影视文化工作室等单位联合摄制，于 2011 年在央视一台黄金时间播出，并荣膺中宣部第 12 届“五个一工程”优秀电视剧奖，获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巨大成功。除上述三部电视剧外，近年来，由彝区本土导演、编剧、出演、摄制的彝族地方方言剧或彝语剧等也呈欣欣向荣之势，如楚雄彝族自治州拍摄的彝族音乐电视系列剧《我是彝人》和彝族方言系列剧《彝人故事》、《哀牢人家》及《马游村的笑声》等都很受当地百姓欢迎。由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筹资拍摄的十集彝语电视剧《噩梦初醒的山寨》反映了凉山部分彝区面临的真实困境，唤起人们与毒品斗争的意识，多个省市电视台对此作了报道，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应。

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彝族题材的电影令我们必须思考一个问题，即这些影视是不是都属于彝族文化产业化的表现，根据产业化定义中“经营性行业”的界定，显然已有的彝族影视中绝大多数都不属于文化产业，而是属于文化事业，具有公益性。在中国，“经营性”活动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事，尤其经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特别是文化产业政策的逐渐建立之后，时间上最早也得从十一届三中全会

召开之1978年后算起。即便是1978年之后拍摄的许多彝族影视亦多为文化宣传的需要，不属经营性质。如此看来，称得上是具有彝族文化产业化性质的电影仅有两部，一部是《绝代：末代女土司》，一部则是《花腰新娘》，而电视剧仅只有一部，即《奢香夫人》，属彝族文化影视产业发展的成果可谓少之又少。

演出业也是彝族文化开发和利用的重要形式，其中包括了彝族的音乐、舞蹈和剧。与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别相对应，这里的音乐包括了声乐（歌）和器乐。这里的剧既包括彝族传统的戏剧（古戏和现代彝剧），也包括彝族文化的舞台剧。音乐、舞蹈和剧是彝族文化最耀眼的表达方式，也是彝族文化最具吸引力的表达方式，有的已跨越民族边界，上升到整个国家的文化精品行列。如彝族音乐《彝族舞曲》被改编为吉他曲、古筝曲、琵琶曲等，成为这些乐器的经典曲目。彝族民歌《阿西里西》被选入中学课本，并被选作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开幕曲，成为世界名曲。就目前来看，对彝族文化开发利用面最广的就是彝族歌舞演出。彝族歌舞的原生性特点使得这是最有可能惠及彝族普通群众的文化资源和产业形式。可以说，在市场经济的当下，彝族歌舞是彝族最直观的文化名片，是其他民族了解彝族文化最直接有效的方式。植根于彝族文化的彝族音乐造就了彝族人最著名的歌唱组合——“山鹰组合”和“彝人制造”。“山鹰组合”是中国音乐史上的第一支少数民族原创音乐组合，于1993年成立，成员系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3个彝族青年。1994年，“山鹰组合”因其专辑《走出大凉山》一举成名，这是该组合的第一盒国语演唱专辑。“山鹰组合”的作品创造性地继承了彝族优秀传统文化，形成属于自己独特的民族音乐风格，悠扬之中蕴含着彝族人特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内在的情感张力。“山鹰组合”是彝族文化产业发展中一次成功的尝试，是彝族传统文化市场化的成功范例。“山鹰组合”已成为彝族文化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象征符号，“山鹰组合”对于彝族文化和彝族人的宣传效果是巨大的，很多人因“山鹰组合”而认识彝族和彝族人，“山鹰组合”本身已内化为彝族文化的一部分，在彝族文化史中是不可不提的。“彝人制造”也是著名的彝族演唱组合，组建于1995年，因2000年推出的第一张原创专辑《彝人制造》而在音乐界成功崛起，获得了无数奖项，还于2002年受邀参加了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得到了更大范围内的认识和了解。可以这样说，彝族歌舞成就了很多彝族人，这种成就除民族音乐的通俗化改变外，还有民族音乐的原生态展演，代表人便是云南石屏县的李怀秀和李怀福姐弟。得益于自己土生土长的民族文化，李怀秀和李怀福姐弟很早就参加了国际国内的各种文化活动，为国家的对外文化交流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随着姐弟俩荣获2006年第十二届CCTV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原生态唱法金奖，姐弟俩的名字和“海菜腔”从此走入中国的千家万户。在彝族舞蹈中，南涧彝族自治县的

“跳菜舞”产业化过程颇具代表性，最能反映彝族舞蹈产业化的历程和现状。“跳菜舞”，俗称“抬菜舞”，也被称为“奉盘舞”，是南涧县彝村，特别是南涧县宝华镇彝村婚丧嫁娶活动中必跳的舞蹈，逢喜事，以“跳菜”进行助兴，遇丧事，以“跳菜”来化解悲伤。相传“跳菜舞”是古时候彝族人敬奉帝王时在宫廷中表演的一种舞蹈艺术，后由于彝族政权的瓦解而慢慢流传于民间。“跳菜舞”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实用性和观赏性。“跳菜舞”有一个逐渐被人们了解和熟悉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最初源于1982年国家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舞蹈家协会联合进行“全国民间舞蹈集成”活动。经南涧县文化局搜集整理，于1991年的时候在大理白族自治州的“三月街民族节”上正式推出，引起巨大的轰动，其后，“跳菜舞”作为南涧县乃至大理白族自治州直至云南省独具特色的文化项目，被引导参加国内和国际的各种文化活动。这一系列的文化活动让成千上万的人认识了南涧彝族的“跳菜舞”。彝剧中，除传统彝族古戏“撮泰吉”被舞蹈化进行零星的商业演出外，作为一种重要的宣传方式，彝剧紧扣时代脉搏推出《杨善洲》等演出内容，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由贵州日报报业集团、大方县委县政府、贵州索玛文化产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于2012年共同打造的现代大型音画史诗剧《九驿长歌》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代表了彝族文化向现代音乐剧演进的有益探索。另外对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利用的代表就是著名舞蹈家杨丽萍打造的《云南映象》，作为一部宏大的云南原生态民族歌舞，《云南映象》自2003年在昆明市公演以来便受到了国内外观众的好评，并逐渐发展成云南文化产业的一张闪亮名片。作为中国文化产业的成功案例，《云南映象》中对彝族的神鼓舞、花腰歌舞、黑彝的伞舞、烟盒舞、打歌和葫芦笙舞，整个演出的分为序，第一场：太阳，第二场：土地，第三场：家园，第四场：火祭，第五场：朝圣。在全部6个主题的27个次主题中，彝族文化为6个，占全部次主题的20%多。演出开场便想起神秘空灵的绿春县牛孔乡的彝族“神鼓”歌谣。遗憾的是目前仍无以彝族文化为主题的系统性的彝族歌舞。

就目前来看，在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中，文化旅游业最能体现文化开发利用的红利，因为它涉及的人口最多，辐射面最广。对于政府主体而言，这个红利就是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抛开文化的层面，文化旅游设施的建设多涉及土木工程等内容，技术的要求不高，旅游设施等往往是相关政府部门政绩的重要体现，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也能为当地百姓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姑且不论文化旅游设施建设的最终效果如何，在可能的情况下对旅游设施的建设往往是相关部门愿意做、乐意做的事情。归纳起来，目前彝族文化旅游业主要有景点旅游，包括人造景点和自然村寨景点，人造景点最著名的有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的彝人古镇和贵州省大方县的贵

州宣慰府（彝语称慕俄格古城）。^① 作为彝族文化展演展示的宏伟平台，彝人古镇是民族文化产业化发展的范例。慕俄格古城则源于电视剧《奢香夫人》的拍摄，随着电视剧《奢香夫人》在全国的热播而成为贵州省著名的彝族文化旅游景点。贵州宣慰府是明朝贵州宣慰使霭翠和奢香夫人及其后裔，即历代贵州宣慰使处理政务之地。贵州宣慰府始建于蜀汉时期，坐落于大方县北郊螺蛳塘畔，时称罗甸王府，到明代始称贵州宣慰府，明朝天启四年（1624年）因战争毁于一旦。为了拍摄电视剧《奢香夫人》的需要，在贵州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毕节地委、行署及大方县委县政府于2008年12月开始重建贵州宣慰府，即慕俄格古城，历时一年，于2009年12月基本竣工，占地137亩，总建筑面积7969.8平方米，主体建筑为“一场八院九层”。其中广场占地18325平方米，呈葫芦形，源于彝族葫芦崇拜。九层衙门为沿中轴线往上依次排列九间大殿。其中第一殿是贵州宣慰府正厅；第二殿彝名“恩奥栋谷”，汉意为吏部；第三殿彝名“菲柯栋谷”，汉意为刑部；第四殿彝名“够葛栋谷”，汉意为工部；第五殿彝名“拜项栋谷”，汉意为户部；第六殿彝名“姆骂栋谷”，汉意为兵部；第七殿彝名“更兹栋谷”，汉意为门下省；第八殿彝名“吉略栋谷”汉意为王殿；第九殿彝名“毕摩栋谷”，汉意为供奉祖灵的地方。“九重衙院”的功能囊括了如今的人事、司法、建设、水利、交通、军事、外交等政府功能。在彝区，依托彝族文化的各种人造景点大大小小的还有很多，如昭通市昭阳区的彝族“六祖分支广场”，玉溪市峨山县的“阿普笃慕”广场等，这些人造景点都不同程度提高了建造城市的文化内涵，成为彝族文化产业化运作的成功范例。除人造景点外，还有很多彝族风情浓郁的彝族自然村寨，如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弥勒县的可邑村，因彝文古籍《阿细的先基》而闻名中外，可邑村保留着彝族阿细人较为完整的民俗文化。云南石林县的大糯黑村保留着彝族撒尼人完整的民俗文化。在中国，像可邑村和大糯黑村这样的彝族村寨还有很多，通常以凸显彝族某一具体文化为特色，如贵州毕节市威宁县的倮嘎村以彝族古戏“撮泰吉”闻名，章赫县的阿西里西村以彝族“铃铛舞”闻名。在彝族名村的形成过程中，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及相关非政府组织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彝族文化旅游业中，除了景点旅游外，还有民俗旅游，尤其是“火把节”等民族节日旅游。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消费已成为许多人消费的一种常态。“火把节”所特有的彝族风情及其活动的群众参与性特点使得“火把节”已跨越民族边界，成为举办区域内所有人的共同节日。除彝族传统节日外，还有许多政府部门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自行定义了一些旅游文化节日，如大姚县昙华乡彝族的“插花节”、永仁县彝

^① 彝人古镇官网：<http://www.yrgz.com/gsjs/gsjs.html>。

族的“赛装节”，等等。

文物和艺术品业也是彝族文化开发利用的重要形式。彝族文物流失严重，主要流向两个方向，一是民间爱好者，一是由政府资助的有关文化事业单位，如中国民族博物馆、云南民族博物馆等文博单位。彝族文化艺术品业开发利用的主体是民间，主要包括彝族漆器、服饰和其他。彝族漆器是彝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彝族髹漆技艺于2008年6月入选国家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彝族漆器多为实用器皿，曾经是历史上彝族人日常生活的必用器皿。彝族漆器有两个中心，一个是四川省凉山的喜德县，一个是贵州省毕节市的大方县。漆器也分别是这两个县招商引资着力扶持和打造的文产项目。如，凉山彝族自治州喜德县犇驰漆器有限公司就是喜德县县委、县政府招商引资成立的专业的彝族漆器生产公司。毕节大方县的几家漆器厂也都生产彝族漆器。同样，彝族服饰既是实用品，也是艺术品，除了彝族人使用外，也常被游客购买收藏。除彝族漆器和服饰外，彝族乐器、皮器等也是彝族工艺品的代表。此外，像刺绣、服饰、银饰等也是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利用的重要内容。

二、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利用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随着国家的重视和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完善，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已有了一定的成果，但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归纳一下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缺乏对彝族非物质文化资源的明晰认识

经过调研发现，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利用过程中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人们对该文化资源缺乏清晰的认识。这里的人们既指部分地方领导干部，也指普通百姓，这是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利用过程中面临的首要问题。因为缺乏了解，所以就谈不上开发利用。对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了解的人不多，包括彝族人自身。目前对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对了解的人群主要包括非遗持有者和相关研究者。虽在现代传媒的帮助下人们对部分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逐渐开始了解，但这种了解也多限于表面，并不深入。这种文化表象背后更深的文化内涵往往需要开发利用者以某种科学可行的方式进行呈现，而对文化的深入了解便成了所有开发利用行为的前提。

（二）缺乏开发利用的复合型人才

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利用对人才的要求很高，即需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有较深入

的了解，也需要具备市场经济方面的相关知识，二者缺一不可。于是，在现实生活中就出现了对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颇有造诣的专家学者往往缺乏市场经济的相关知识，而从事市场经济的优秀人才又因对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缺乏了解而不会涉足，如何搭建文化与市场间的桥梁便成了未来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利用必须解决的问题。

（三）开发利用过程中存在着诸多利益博弈

“经营”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利用的手段，“市场经济”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利用的核心参考。但开发利用过程中文化持有者与文化开发者之间的利益博弈仍是民族文化开发利用中的最大问题。以贵州著名的西江千户苗寨为例，存在着旅游企业与当地居民，即文化持有者之间的尖锐矛盾，旅游企业与当地居民间处于一种不对称的竞争过程中，旅游企业处于强势，而当地居民则处于弱势，为此当地居民甚至采取带景区外的游客逃票进入景区，“62.27%的被调查村民表示，旅游项目经营收入的最大受益者是景区旅游运营公司。说明，随着景区旅游开发的不断深入，当地村民要求享有旅游资源开发带来的更多收益，虽然景区政府也采取措施让更多的村民能切实地从旅游资源收益中受益，但由于相关的法律政策仍处于起步阶段，没有形成完善的体系，且措施的可行性与可操作性较弱，因而仍存在一些问题”^①；“这些情况使得西江苗寨在短期内，各利益相关者间可能存在尖锐的利益冲突”。^② 产业化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在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利用过程中同样存在众多的利益博弈，主要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有者、管理者和开发利用者三个利益群体。三个利益群体间的利益分配往往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秦莹在《从村寨到舞台——南涧彝族“跳菜”商业展演的民族志研究》一文中关于“跳菜”利益群体间的利益分配有这样一条记载：“这些年还去过广西桂林，因为演出单位是和县文体局挂钩的，桂林那边发给1000元，但文体局要扣200元，伙食费再扣掉200元，就只剩下600元了。”^③ 当南涧“跳菜舞”开始从乡村逐渐走向市场后，由于受市场经济利益最大化规则的影响，在南涧彝村出现了一批从事“跳菜”的职业艺人，但经过一系列“游击队”式的市场闯荡后，经历过上当受骗、多地转移的折腾，往往赚不了多少钱，很多

^① 贺银花等：《民族乡村景区村民权益现状的调查与研究：基于西江千户苗寨的调查》，载《贵州农业科学》，2013（5）。

^② 刘春莲等：《西江千户苗寨旅游开发中利益相关者分析》，载《安徽农业科学》，2011（1），329~330页。

^③ 秦莹：《从村寨到舞台——南涧彝族“跳菜”商业展演的民族志研究》，见《走向市场的民族艺术》，43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